

●徐向艺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 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理论初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理论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实践的结果，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这一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难免出现一些偏差与失误。用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创立这一理论过程的得失，对于推动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的规律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并不是直接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革命斗争的，而是首先参加推翻反动统治、争取民主制度的胜利，然后从事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因此，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就有一个如何处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有一个解决从前者到后者转变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和过渡理论的继续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和策略，给无产阶级的斗争以科学的指导。在19世纪中叶，法国面临着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同英、法相比，将在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到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主张无产阶级积极地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主张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战斗口号。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时，同时考虑到工业发达国家和工业不很发达、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的现实情况。恩格斯说：“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①马、恩的这些论述，初步提出和阐明了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及其革命转变理论。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制定了更加完备的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列宁提出了

系统的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实现民主革命，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就是无产阶级要和农民结成联盟，并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列宁说：“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②列宁在阐述关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时，针对第二国际领导人主张的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③列宁的这些思想，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指导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转变理论的重要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就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针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无产阶级积极参加和推动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由此为起点，才能把中国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正确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正确解决从前者向后者进行转变及其转变的条件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问题，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巩固”，“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次奋斗”，就能“即刻成功”。^④1925年，党的“四大”又提出，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能否紧接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革命准备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等等。显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两个阶段的关系问题上，已初步注意到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与结果的分析，但是对于两个阶段革命转变的方式和策略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了解决革命转变问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较为集中地阐述了解决中国两个阶段革命的关系和革命转变问题的理论和策略，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正确方向。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科学论断，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两个阶段的设想付诸实践。在实践探索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政策和策略，如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政策，农业集体化应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依次递进的政策，对手工业的改造应与手工业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结合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把对企业的改造与资本家人的改造结合起来的政策，等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独创性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宝库的丰富和发展。

二、毛泽东的有中国特点的三大改造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理论的历史起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同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实现形式有着不同的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揭示的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我们只有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遵循马

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才能明确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并没有解决各个国家怎样实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形式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由千百万人坚持不懈地实践才能解决。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天起，都在探索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从1921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全国解放以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⑤所谓“长期历史经验”，就包括建国后头七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经验。建国初期，毛泽东和我们党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出发，创造性地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路线、政策和策略。对于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在不长的时间内，将几亿农民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在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提出了促进手工业的半机械化、机械化与保持手工业工艺特色相结合的政策，顺利实现了城市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逐步过渡，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在实现赎买的过程中，我党始终贯彻执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包括对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关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

关于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经验，始终体现了中国特色和中国特点。可以说，毛泽东和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所提出的三大改造理论是我党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系统理论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三、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理论探索的偏差

1981年，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很成功，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上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急了一些。”^⑥这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经济理论探索的功过是非。毛泽东在应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学说过程中，曾出现过认识方面的偏差和实践方面的失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理论创造中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的统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因而也意味着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这一思想是明确的。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以后，是巩固、发展一段时期，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立即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没有明确回答。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现状，以及毛泽东对新民

主义社会形态的理想描述，我们可以推断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以后，应该巩固、发展一定时期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少奇同志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受到毛泽东的严肃批评，并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⑦显然，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以后，毛泽东就产生了“立即过渡”的思想。这就反映了毛泽东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了，反映了他在过渡问题上开始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创造中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的历史实际。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一些著作中，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拔高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提法。^⑧这决不是一次偶然的“笔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明确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现代经济不发达。“那末，在革命胜利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⑨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从属于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解放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毛泽东在全国解放以后，开始使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提法，这就把“资本主义”替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这样势必在认识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和发挥的能力，把资本主义误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起点。这一理论上的失误，在实践中必然导致较严重的后果。例如，在三大改造过程中，过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仅资本主义工商业，甚至连个体手工业也几乎全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脱离了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才纠正了这一历史性错误，制定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政策。

第三，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后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创造违背了“革命和建设同时并举”的最初设想。毛泽东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这一“革命与建设并举”的思想是符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初，毛泽东规定完成这双重任务的时限为10年到1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曾说恢复时期3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大约需要18年）。后来，对总路线正式表述时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的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是在实践中，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反映在1955年是整顿、巩固现有农业合作社还是大力发展新的农业合作社问题上。1955年，由于许多农业合作社是在违背自愿原则的强迫命令下组成的。党内有的负责同志提出要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理由之一是农业还没有进入机械化阶段，急速冒进推行集体化难免出现不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随意改变生产关系的现象。开始，毛泽东对整顿合作社的建议是支持的。但很快他就对缩减合作社持反对态度，并对农村一些“闹事”现象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对党内放慢合作化步伐的主张斥责为“小脚女人”。1955年，毛泽东开始部署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事实上，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在1955年到1956年一年时间内完成的。很显然，毛泽东由“革命与建设（下转第19页）

照国际性城市的标准来发展和改造自己，那与构造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并行不悖。

产业接轨。“诸侯经济”的征象之一是重复建设，结构趋同，过度竞争。在市场驱动下，区域经济的发展要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新路。国际化大都市及其都市圈，同样有这个要求。这里，为大都市服务和发展自己，是相辅相成的。苏南与上海有长期合作的经历，今后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一方面，某些传统行业和老产品会从核心转移到外围；另一方面，某些高新技术行业和新产品则会相对集中，双方都要有所取、有所舍。在这个意义上，甘当配角、甘拜下风并不是落后，那是为了共同的先进。至于为大都市继续供应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商品、物资，更有利于彼此的一起发展。

基础设施接轨。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不仅在市內，还延伸到都市圈和更深远的腹地，否则不能发挥其吸引力和辐射力。完成这个任务，也要靠同心协力。特别是苏南和南通，沿江沿海，有好的港口，将成为上海的转运基地或发电基地，不能看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搞好这些基础设施，同时也在完善自己的生产建设环境。

改革开放接轨。经济发展靠改革开放。上海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改革开放必须超前，并与国际惯例相衔接进而基本上按国际惯例办事。这对都市圈来说，也不能降低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体制差异，影响协调运行。这涉及到很多领域，除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外，在培养市场上，以金融市场为主导，带动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信息、土地等市场，都要逐步发展，与上海相联，形成统一市场，统一机制。开放的具体政策现在还有一定落差，今后必须统一到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上来，彻底消除任何“大战”。

为上海构造都市圈，既是上海发展的需要，也是江苏首先是苏南发展的需要。这个地区不联成一片，将影响本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

（上接第6页）同时并举”的思想已改为先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国家的工业化的思想。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变化，不仅在实践中产生一些政策偏差，而且给他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造成困难。如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把过渡时期又改变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等等。毛泽东后来所推行的路线、政策不能不说与上述思想的转变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2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

③《列宁选集》第4卷，第619页。

④《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上，第40页。

⑤⑥《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266页。

⑦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21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0页。

· 书讯 ·

颜光华主编《实用经济控制论》出版

我校工业经济系颜光华教授和严学丰教授主编的《实用经济控制论》一书，最近由立信会计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科学地运用控制论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过程，既阐述宏观控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着重从微观方面研究了企业经济活动控制的原理，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一份新成果。

（朱）